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卷/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5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ISBN 978 - 7 - 5095 - 1346 - 0

I. 1…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经济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 ②劳动就业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 ③收入分配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 IV. F129. 72
D669. 4 F124.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6853 号

责任编辑: 梁 涛

责任校对: 黄亚青

封面设计: 陈 瑶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51.25 印张 1 352 000 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346 - 0/F · 114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本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房维中

主 编 刘国光 王洛林 毛福民 杨冬权

副主编 董志凯（常务） 武 力 徐建青

段东升 李明华 李和平 杨继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洛林 王晓峰 石建国 史纪辛

刘国光 刘美玲 刘贵贞 许 虹

许卿卿 曲 韵 陈廷煊 李小宁

李应和 李和平 李明华 武 力

杨冬权 杨继波 段东升 赵月琴

赵学军 贺德海 郝和国 姜长青

徐建青 程连升 董志凯

总序

刘国光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砺和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21 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 21 世纪初叶，面临全球化、现代化潮流中的竞争和挑战，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综合国力和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实施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抚今追昔，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大型经济学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正是来自这一宗旨。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所涉及的八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从 1958 年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年在建大中型工程项目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位数上升到千位数，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型项目。在这一阶段史无前例的探索历程中，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又在迅速走出困境的同时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经验，其中一些经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丰富内容，对于国史、党史、经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0 年底基本结束的三年“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试图摆脱苏联高度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探索。但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成本的大干快上，“大跃进”期间，一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改善了工业布局，农村工业第一次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农业的严重减产和饥荒。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我们对于以农业为基础、从全局出发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为了摆脱困境，1960 年底，党和国家对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 1961 年开始，我国经济体

制和经济运行进入了长达五年的调整时期。其中,1961—1962 年为初步调整阶段,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体制偏差,强调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在农村,将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农、轻、重关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精简“大跃进”期间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关、停、并、转效益差的企业等。从 1961 年下半年起,为活跃商品流通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三类物资(包括工业品、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管理方面有所放松,集市贸易有所恢复,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在工商企业,通过颁行《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办法,重新建立起规章制度和秩序。到 1962 年底,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

经过三年调整,渡过了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63 年 9 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到了 1965 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这时受国际战争环境紧张的影响,我国形成了国防第一、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农业经济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国有企业可以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代替行政手段,例如试办托拉斯、推行经济核算、强调利润指标和恢复奖金制度;希望发挥市场调节的拾遗补缺作用,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这种思路为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另一种思路从维护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出发,联系中苏两党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批评上述探索为修正主义。由于两种思路是在反复探索 and 实践中形成的,其中穿插着大量的调查研究、典型试验,以及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干部思想革命化”、农村“四清”、城市“五反”等各种政治运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后一种思路在当时占了上风,为此后的“文革”作了铺垫。

抚今追昔,这些探索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供研究。通过阅读这批档案资料选编的内容,可以体会到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对于这些探索与尝试中的经验教训多一些了解,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而且对于现实与未来必将有所启迪。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和《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续编。与以往两批资料相比,第三套档案资料涉及的时限更长,内容更加丰富,数量也更多。全套丛书共计 10 卷,约 1 500 万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通力协作,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查阅了卷以千计、字以亿计的档案资料,含辛茹苦,历时六载才编辑而成的。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

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学术资料。以往两套资料的出版，已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推动产生了一批有创新见解的国史、党史和经济史的科研成果。本套资料的面世，必将有助于更多富于创见的新成果问世。

在性质与体例上，这套丛书与前两套一样，仍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兼有资料性和学术性双重意义。一方面，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在有限的篇幅中，为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另一方面，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卷，编排成书；纲目设置原则为历史顺序和经济理论逻辑与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它兼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可以说，这套丛书也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史书，这项工作更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档案局、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待再版和续编时改进。

2009年12月

凡 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继第一批（1949—1952年）、第二批（1953—1957年）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之后，第三批为1958—1965年的档案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1958—1965年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部分卷的内容间或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每一批丛书有“总序”，反映该批档案资料编辑的宗旨、目的、意义及其共同点。各卷写有“前言”，概述该卷的基本内容；书后附部分资料索引。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X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按“1、2、3”排列。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确保材料精练，增加信息容量，对档案资料分别采用全录、节录、摘录方式处理。凡采用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发文方文后不再重列；凡采用小部分内容节录、摘录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按页编序码。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联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号；凡为遗误字，在该字后面加〔？〕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部分国家机构采用简称（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分别简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中央批转文件的收文方部分省略。部分档案资料出处以数码代之。数字为建立档案资料的部门、单位或资料书的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录中有代码索引。

十、各卷附相关“要事年表”。

前言

程连升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按照原来的设想，1958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推进基本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继续推进、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事实是：进入1958年后，在不断批评“反冒进”和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政治号召下，中国发生了持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钢铁工业的“超英赶美”和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导致经济建设的极度混乱和巨大挫折，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现了“欲速而不达”的被动局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国不得不进行了长达5年的艰难调整，逐渐把被弄乱了的经济关系恢复过来，经济建设工作重新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

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工作是国民经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工作一样，劳动工资工作在1958—1965年间也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道路。本卷档案资料选编就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变化轨迹的真实记录。本卷所辑录的档案资料分为7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工资总体概况，包括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状况、劳动工资的计划安排、劳动工资计划执行情况总结。第二部分是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调配，包括推行新的劳动就业制度、劳动就业的安置政策、劳动力的招收和调配、城市职工精简、加强农业生产劳动力等。第三部分是劳动力的培训和使用，包括技工学校培训、学徒培养、半工半读教育、城镇劳动力的管理使用。第四部分是职工工资，包括工资制度和工资政策，工资标准与待遇规定，计件工资、奖励工资和津贴制度，工资水平的调整与变化，社会各界对工资问题的反映。第五部分是劳动保护，包括劳动保护的形势与任务、职工伤亡事故分析报告、安全生产措施及其实施、职工劳动条件等。第六部分是职工劳动保险和社会福

利,包括企业职工劳动保险、职工的退职退休制度、社会优抚救济制度、社会集体福利事业、福利事业费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第七部分是城乡居民生活,包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解决职工生活困难的解决办法、居民生活状况等。

总体上看,1958—1965年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工作经历了乱、困、改的复杂转变。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同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实践分不开的。综观这一时期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劳动力配置屡受冲击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普遍愿望,也表现出国家领导人想快速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急躁心情。正如后来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配置工作陷入了严重混乱。无论是既定的劳动调配计划,还是现有的劳动就业法规,统统被看做是生产力解放的障碍而横遭破坏,以致给关系国计民生的劳动就业工作造成了空前冲击。

冲击的表现之一,是城镇职工人数大起大落。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后,为了在当年完成钢产量比上年翻番的任务,就在全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找矿挖煤,砍树炼钢。与此同时,还兴起了各行各业的“大办”:大办电力、大办交通、大办农业等等,形成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局面。影响到人力配置方面,仅1958年就增加了2080万城镇职工。

冲击的表现之二,是不仅工资总额和商品粮供应远远超出了国家的负担能力,而且也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人民生活陷入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因此,随后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艰难工作。

冲击的表现之三,是职工技术教育出现了泡沫现象。在“大跃进”浪潮的影响下,技工学校也跟着“大办”起来,各种没有质量保障的技校遍地开办,招收学生人数急剧膨胀。据统计,1957年末全国仅有技校144所,学生6.5万人;但到了1961年底,全国技工学校迅速增加到2021所,学生54万人。这些新建技校绝大多数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办学条件。1962年以后经过整顿,大批技校停办,最后保留下370所。在这一办一停之间,势必造成很大的浪费。

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鉴于1956年招工失控的教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制止盲目增加职工,规定各企业、事业单位增加人员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审定后,报中央审批。但仅仅在3个月之后,即1958年6月,在“大跃进”及计划管理和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情况下,各地区又将招工权层层下放,因而引起了职工人数的猛烈增长。在1958年职工人数猛增2080万人的基础上,1959年和1960年职工人数继续增加,1960年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即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职工人

数的剧烈增长，给农业和市场带来巨大压力。

1960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以后，精简职工成为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简职工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简职工的工作正式展开。从1961年1月开始到1963年上半年，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全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除新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外，净减职工1744万人；同时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减少了国家工资开支和商品粮的供应，对恢复和发展农业、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起了巨大作用。

二、收入分配制度严重混乱

在“大跃进”中，随着浮夸风而来的，是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因此，一时之间，社会上形成了批判并取消计件工资制度、奖励制度和津贴制度的浪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9月到年底，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取消计件工资的有230万人，实行计件工资制的生产工人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40%下降到14.1%。计件工资、奖金和某些津贴的取消，降低了职工收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于1958年和1959年给企业职工发了半个月标准工资的“跃进奖”。1960年以后又逐步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

在取消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同时，一些地方还施行了半供给半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当时主要是在农村人民公社、新建的钢铁煤矿企业中进行了普遍的试行，在个别老企业中也有试行的。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由于工资部分所占比重小，使部分职工收入降低，同时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热情，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就相继停止了。

在半供给半工资制的分配制度试验失败后，我国工资问题一直处于局部调整的状态。重点进行了以下工作。

1. 实行工资的局部调整。一是在1959年、1961年和1963年均安排了职工升级；二是结合职工升级，简化了工业、交通企业干部的工资标准，实行了类似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等级制度；三是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标准，使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工资较低的人员的工资有所提高；四是对工资区类别作了个别调整。

2. 重新肯定按劳分配原则。在1959年10月召开的全国工资座谈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提出了确定工资政策的五项原则，即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以此作为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基本原则；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工资福利不可不增，亦不可多增；从6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高低过分悬殊；表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形式应当是有利于生产和职工团结。这些原则的确立，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赞成。

3. 逐步恢复并改进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制。1961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明确提出工资形式不能笼统地规定以哪种形式为主，而只能按实际情况办事。凡是需要和可能实行计件的，就应当实行计件工资制。在中共中央鼓励实行计件工资的影响下，各地都作了相应的部署和规定，使国营企业恢复了计件工资制。与此相配合，各地区、各部门也在实施和改进综合奖励制度的过程中，

逐步恢复和建立了单项奖励制度。

4. 在三线地区进行“一条龙”工资标准的改革试点。所谓“一条龙”工资方案，就是将全国各行各业各类职工五花八门的工资标准改为不分产业，不分工种，不分干部、工人和服务人员，都实行一种统一的25个等级的工资标准。行政人员全部占用25个等级，科学技术人员占用20个等级（6~25级），工人占用12个等级（14~25级），在工资标准表中只用等级线来区别各种职务、工种的工资。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一条龙”工资标准在西南地区的部分行业进行试点。到1965年，全国共有1000多个单位进行了测算，50多个单位、60多万职工进行了试点。试点改革后，职工增加工资并不多，但大都比较满意。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条龙”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在全国普遍实行。

三、劳保福利政策有所完善

1958年2月6日，国务院第70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四项重要规定，即《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这四项规定的颁发执行，使新中国的劳保福利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1. 在职工的退休政策方面，暂行规定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分别执行的状况统一了起来，并适当放宽了退休条件，使有些年岁不老，但工龄长、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也能够享受到退休待遇。另外，该规定还对退休的各项待遇，包括退休费、易地安置费、公费医疗待遇，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的丧葬补助费和亲属抚养老费等，都作出了统一规定。

2. 在职工的探亲方面，暂行规定统一了全国的职工回家探亲假制度，规定工作满一年的正式职工同父母、配偶都不住在一起而又不能利用公休假日回家团聚的，均可以给2~3周的探亲假。假期内的工资，照本人计时工资标准100%发给；探亲往返车船费，原则由本人自理，如果自理有困难的，可由本单位给予补助（1962年修改为职工回家探亲所需的往返车船费全部由所在单位报销）。

3. 在职工的待遇方面，暂行规定制定了新的原则，提出建筑业中正式的和临时的普通工（1~3级）的工资，应该以相当于当地中等农业社中劳动力较强的农民收入加上城乡生活费用的差额予以规定。其他部门的普通工，应按相当于或略低于建筑业普通工的工资标准确定。杂勤工的工资标准，最高以不超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第28级为原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具体规定。

4. 在学徒的学习期限和待遇方面，暂行规定改变了过去学习期限太短和生活补贴偏高的弊端，新定学徒的学习期限为3年，最短者也不能少于2年。学习期间的生活补贴，按照当地或本行业一般低级职工的伙食费另加少量零用钱来计算。学徒转为正式工后，领取所在单位的最低工资，工作满一年后，再评定他们的技术等级和工资等级。

四、艰难试行新劳动制度

建国后的最初7年，一方面，我国对旧军政人员、文教人员、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私

营的职工都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对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以及城镇户口的复员退伍军人统一分配工作，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安置和招收的职工又不准随意解雇。这两方面的规定，形成了“只进不出”的固定工制度。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开展，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察觉到固定工制度带来的弊端，因而产生了调整改革的思想。1957年4月，劳动部召开了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会议，提出以后劳动力的安置必须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通过订立劳动合同改进固定工制度，逐步把劳动力“只进不出”的状况改变为“有进有出”的局面。

1958年，推行新劳动制度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先是刘少奇于4月份在四川省、市委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革现行劳动工资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讲话，并建议四川省首先进行劳动合同制的试点。随后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同时并存的设想。6月份，中共中央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县以上新建工业企业，从农村招工实行亦工亦农制度，不采取“包下来”办法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试行这种新的用工制度。此后，新的劳动制度在全国迅即推行。

1959年12月，劳动部颁发了《关于劳动力招收和调配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提出“在用人制度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长期工、合同工、亦工亦农的办法”。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一般的做法是：招收农村劳动力实行亦工亦农制度，招收城市劳动力实行临时工制度，都要签订劳动合同。从1958年到1959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从社会上招收的新职工1661万人，大多实行了新的劳动制度。

在1961年到1963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于精简职工，新劳动制度的推行暂时处于停滞状态。到1965年5月，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又重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倡导全国各地企业要多用临时工和合同工，少用固定工。于是，各地区、各部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再度进行了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广泛试点。根据27个省、市、自治区1965年6月底的统计，共有试点单位2500多个，亦工亦农人员达到58万多人。

推行新劳动制度，对于合理调配劳动力，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农民技术，促进劳动效率，缩小工农和城乡差距，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正当全国积极推行新劳动制度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新劳动制度作为刘少奇“分裂工人阶级”、“搞修正主义”的罪状被大肆攻击，临时工和合同工纷纷被转成了正式工。这样，新劳动制度夭折了，固定工制度反而被进一步强化。

五、劳动保护曲折发展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广大职工群众生产不计条件，劳动不讲报酬，表现了极高的劳动热情。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拼体力、拼设备、违章作业的极端现象，导致生产秩序，特别是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被严重破坏。许多领导人员违章指挥，工人连续苦干，职工不能休息，设备带病运转，从而造成了厂矿企业伤亡事故频繁发生。统计数据表明，1958—1960年的3年间，县以上国营企业因工死亡人数分别比1957年增加3.39倍、4.48倍和5.92倍。

针对企业加班加点、违反操作规程现象盛行,生产安全和职工健康受到威胁的严峻形势,劳动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60年4月召开了第4次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会议端正了安全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提出重视和做好劳动保护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关系。会议还对劳动保护工作的任务、内容和方法给予了明确的规定。

随后几年,依靠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各部门、各厂矿企业认真贯彻群众路线,设置专门的机构,如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技术科和安全员,负责劳动保护的日常工作,不断强化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各地企业在开展技术革新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条件,变繁重劳动为轻便劳动,减轻劳动强度,消除许多影响职工安全和健康的危险因素,防止和减少职业病与职业中毒。各级劳动管理部门不时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开展安全生产竞赛,推广先进经验,制订和贯彻执行劳动保护规章制度,督促企业制订和实施安全技术措施及计划,解决防护用品和设备。各级工会组织和妇联组织宣传劳逸结合,监督企业安排好职工的劳动和休息,并强调进行对于女工的特殊保护,妥善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由于生理条件而引起的一些特殊问题。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安全生产得到了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有了积极进展。

六、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历时3年的“大跃进”严重损害了国民经济,导致居民物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61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下降了20.1%,其中,非农业居民下降了24.1%,农业居民下降了21.4%。1957—1961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少,由203.06公斤降到158.78公斤;猪肉由5.07公斤降到1.41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73公斤;布匹由6.82米降到2.87米。粮食下降21.8%,猪肉下降72.2%,食用植物油下降43.4%,棉布下降57.9%。1960—1961年,全国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和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

农业生产的浮夸和破坏,造成食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并导致全国性饥荒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959年已经开始、1960年进一步扩大的饥荒,地域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城市凭票供应的商品,由1958年以前的7种增加到1960年的近50种,许多大城市的粮食库存基本挖空,粮食出现脱销的危险。农村的状况更加严重,有的地方每人每天只能吃6两粮食,不得不用野菜、瓜果甚至树皮充饥,导致营养极度不良,不少人因此患病死亡。后经几年的调整恢复,国民经济有所好转,饥荒局面大为改变,但终其8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到1965年底,无论是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还是全国人均消费的粮食、食油、棉布,均低于1957年的水平。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本卷编辑者程连升,助理黄敬。

目 录

第一部分 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工资计划	(1)
一、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状况	(3)
(一) 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影响因素	(3)
(二) 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结构	(16)
二、劳动工资管理体制与计划安排	(23)
(一) 劳动计划管理体制	(23)
(二) 劳动工资计划安排	(32)
三、劳动工资计划执行情况	(61)
(一) “大跃进”对劳动工资工作的影响	(61)
(二)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劳动工资情况	(71)
(三) “二五”时期劳动工资的比例关系	(89)
第二部分 劳动就业和劳动力调配	(95)
一、推行新的劳动就业制度	(97)
(一) 新劳动制度实行的原因和内容	(97)
(二) 亦工亦农制度的实施范围和执行办法	(99)
(三) 试行亦工亦农制度的调查报告	(108)
(四) 国营企业临时工制度改进办法	(119)
二、劳动就业	(123)
(一) 劳动就业的方针政策	(123)
(二) 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安置	(126)
(三) 特殊人员的就业问题	(147)
(四) 劳动就业状况调查	(152)
三、劳动力的招收和调配	(159)
(一) 关于劳动力招收和调配的政策	(159)
(二) 劳动力招收中的矛盾与问题	(168)